

一九〇五年 俄國革命和中國

黎 澍 等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〇五年
俄國革命和中國

黎 澍 等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武漢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和中國

黎 澍 等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 332 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 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

書號：859·787×1092 耗 $\frac{1}{32}$ 開·2 $\frac{1}{8}$ 印張·41,000 字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9,000

出版者的說明

俄國革命是歷史上最早地直接影響及於我國的一次國際革命運動。當時，以孫中山爲首的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雖然還非常幼稚，但却是淬厲奮發。俄國人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英勇的鬥爭精神，給予他們以重大的鼓舞。我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在一九〇五年以後，開始進入了廣泛發展的新時期。這裏黎澍同志、榮孟源同志的兩篇文章論述了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對我國的影響，安·米·潘克拉托娃院士的文章則論述了俄國一九〇五——〇七年革命的國際意義。這三篇文章曾先後在“歷史研究”（雙月刊）上發表。這次承黎澍同志、榮孟源同志和“歷史研究”編輯部同意編在一起出書，前兩篇文章並承作者在發排前對文字作了若干校正，特在這裏表示謝忱。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目 錄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和中國·····	黎 澍	1
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對中國的影響·····	葉孟深	24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 革命的國際意義·····	安·米·潘克拉托娃	46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和中國

黎澍

列寧指出，“在東歐與亞洲方面，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是在一九〇五年開始的”。^①東歐比較西歐來說曾經是落後的，亞洲曾經是更加落後的。所以東歐和亞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開始都比西歐晚得多。然而從一九〇五年到現在的半個世紀中，恰好是在這個地區，出現了世界人類最先進的事物：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本來先進的西歐（美國也一樣），從社會制度來說，反而落在後面。在那裏，正如列寧所說：“只有無產階級才是先進的階級。而尚存的資產階級則甘願去幹一切野蠻，殘忍和犯罪的勾當，以求保持垂死的資本主義奴隸制度。”^②

東歐和亞洲所以能够從落後變為先進，決定的因素就在於，在這個世紀的最初二十年中，在跨越歐洲和亞洲佔全世界面積六分之一的偉大的俄國連續地爆發了三次革命，並在最後一次革命中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① 列寧：“論民族自決權”，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頁八三一。

② 列寧：“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同上書，頁八一—九。

列寧主義以在俄國三次革命中不斷加強的論據打破了第二國際的教條。列寧主義指出，革命的爆發和勝利並不一定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地方，而可能是在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地方，因為這些地方在世界帝國主義戰綫鍊條中是最薄弱的環節。

俄國是這樣的地方。東歐和亞洲是這樣的地方。因此，世界風暴從西歐向“東方”轉移是必然的趨勢。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以後，東歐各國的力求建立民族獨立和民族統一國家的運動沸騰起來了，在亞洲國家首先是在中國出現了列寧所說的“世界風暴底新源泉”●。

中國曾經是一個長時期與外隔絕的國家。在這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是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人民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封建文化在這裏達到了高度的發展並在羣衆中有着深刻的影響。雖然中國人很早就與歐洲人有過往來，但是這種往來並未改變中國的與世隔絕的狀態。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青年有很大的影響，而在革命正在進行的當時甚至還不足以使中國人感受到任何震動。一八四八年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和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在當時對中國仍舊是沒有影響的。

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曾經是這樣一個信號，它表明中國已不可能像已往的時代一樣地存在下去了，中國必須學習外國並經過嚴重的改革才能免於被奴役的命運。

在鴉片戰爭時期的統治階級中有極少數人，例如，堅決地進行了反對外國人在中國販賣鴉片的鬥爭的兩廣總督林則徐和中國第一部系統地介紹資本主義世界的書“海國

圖志”的作者魏源等，已經注意到改革的必要，發表了有益於禦侮圖強的見解。但是昏庸的滿清統治者並不認識他們所面臨的任何問題。儘管來自西方的侵略者繼續用當時最新式的武器來進攻中國，用鴉片和各種各樣的工業品來吸收中國的農產品和白銀，排擠中國的手工製造品，使中國日益成為主權不全的國家，人民日益陷於貧窮的境地，滿清統治者仍舊拒絕任何改革。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認為放棄“祖宗的成法”和學習外國是屈服於外國的可恥的表現。他們堅持用中世紀的古舊的方式來保衛自己。

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革命把中國推進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一批連接一批出現了如同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向西方尋找真理的進步分子。人們開始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有實行改革的必要了。

當時滿清政府中以曾國藩和李鴻章等為首的一部分官僚感覺在太平天國戰爭中已被嚴重削弱的帝國必須加強武備才能繼續維持下去，因此開始向外國購買軍火，並且建立了一些軍事工業和商品工業。他們的這種作為被認為是“新政”。

“新政”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生長。但是它的軍事的和壟斷的性質引起了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許多進步分子的不滿。他們認為如果僅僅致力於加強武備而不鼓勵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自由發展並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國仍舊不可能強盛起來。為了使皇帝和他的大臣們同意更多地學習西方，當時的進步分子力言所有西方的自然科學和

● 列寧：“論亞洲是世界風暴底新源泉”，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版，頁三五。

技術都是中國古人的良法美意在西方發展的結果，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是中國古已有之的，中國的學習西方不過是“復古”、“禮失而求諸野”或“以中國本有之學還之於中國”而已。所以他們的理論一方面固然大大開拓了時人的眼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一種錯覺，好像中國所需要的改革是並不嚴重的。

滿清政府沒有接受進步分子的主張。可是事實是冷酷的教師。“新政”在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中特別是在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中遭受到嚴重的打擊，滿清政府在太平天國戰爭以後三十年間建立起來的艦隊幾乎全部被消滅。人們不能不日益懷疑“新政”的意義。這樣，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便出現了一批新的進步分子，並且逐漸形成了資產階級的要求政治改良的羣衆性的運動。改良運動倡導者康有爲對於滿清政府的批評比較以前的人嚴厲得多。他毫不放鬆地利用滿清在對外戰爭中的每一次失敗來攻擊腐敗的官僚政治，要求光緒皇帝下罪己詔，立即進行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他的主張在一八九八年因爲得到了光緒皇帝和他的親信們的支持，一度成爲朝廷的施政綱領。光緒皇帝在三個月時間裏面發出了大量的進行改革的命令。但是由於資產階級勢力的極端薄弱和頑固分子的有組織的抵制，改良運動很快就在流血政變下失敗了。

在一八九九年，即改良運動失敗以後一年，北方農民用義和團名義組織的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運動繼之而起。義和團的反抗運動是人民對於滿清政府的反動賣國政策的直接的回答。這個運動很快就因爲遭到帝國主義的殘暴的進攻而失敗了。它的失敗引起了中國的進一步殖民地化和

中國人民的反抗運動的進一步高漲。

帝國主義由於中國人民在義和團事件中所表現的強大反抗力量和內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被迫放棄了瓜分中國的計劃。它們在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的影響下開始共同利用滿清政府作為統治中國的工具，從中攫取殖民地利益。上海出版的非官方雜誌“外交報”一九〇四年第三十一號和第三十二號合刊社論“論瓜分變相”一文指出，帝國主義已開始改變瓜分中國的方式，過去它們按地區劃分勢力範圍，而現在則傾向於用零星分割的方式來進行掠奪了。這個變化使中國陷於“謂之不亡不可，謂之亡亦不可”的境地。因為如果說中國沒有滅亡，那麼她的許多主權是屬於外國的；如果說中國已經滅亡了，那麼她在名義上仍舊存在。“外交報”列舉了在當時已經可以看到的足以表明中國殖民地化的如下一系列的事實：

全國稅務屬於英人；

東清（即中東）鐵路修築權屬於俄人；

山海關——新民屯鐵路及山海關——天津鐵路修築權屬於英人；

蘆溝橋——漢口鐵路修築權屬於比人；

天津——鎮江鐵路修築權屬於英人；

正定——太原鐵路修築權屬於俄人；

天津——保定鐵路修築權屬於英人；

山東鐵路修築權屬於德人；

廣州——漢口鐵路修築權屬於美人；

江寧——上海——杭州鐵路修築權屬於英人；

江寧——漢口——重慶鐵路修築權將屬於英人；

雲南鐵路修築權將屬於英人法人；
福建鐵路修築權將屬於美人；
滿州鑛產的開發權屬於俄人；
河南北部及山西鑛產的開發權屬於英人意人；
山東鑛產的開發權屬於德人；
浙江鑛產的開發權屬於意人；
安徽鑛產的開發權屬於英人日人；
四川鑛產的開發權屬於法人；
雲南鑛產的開發權屬於英人；
福建鑛產的開發權屬於法人；
天主教徒屬法人保護；
耶蘇教徒屬英人美人保護；
佛教徒將屬日本人保護；
凡大商家都用外人爲代表；
凡達官都有外人爲奧援；
各省自借外債，都以本省主權爲抵押；

商人因銀根緊急，向外國銀行借款，亦各以所有財產爲抵押；

此外，還有輪船公司和鋼鐵廠等是由外國人經營的，等等。

這種狀況不能不引起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嚴重的恐慌。上海“時報”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七日以“論外人於我國製造土貨”爲題的一篇社論中指出，按照大資本兼併小資本的規律，民族資本必然要被外國資本兼併。“時報”驚呼道：“使外人果于各地設工廠，勢必多用僱工，一時苦力可藉謀生，地方必較前旺盛。然其勢不可久，而使平日非苦力

者一時淪爲苦力，舍于其所設工廠之外，無可謀生。設其廠不能徧收，則皆爲餓殍盜賊而已。”

這時滿清統治已經腐爛到了臭氣薰騰的地步。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吏對人民進行着無微不至的壓迫和剝削。他們用各種名義向人民徵收捐稅，而他們繳送國庫的款項僅僅是人民所交納的百分之三十。人民過着日益窮苦的生活。據中國革命分子在日本出版的雜誌“天義報”一九〇七年第十一、十二、十三和十四期所提供的材料，以江蘇北部而言，自耕農除購買原料及完納捐稅外，平均每天所得爲三分（以一家六口，四個勞動力，耕地四十畝計算）；佃農收入百分之五十歸地主，平均每天所得不到一分半；僱農長工每年所得爲六——七元，工資最高的農忙短工每天所得爲一角——一角五分。因此，江蘇的農民發出了這樣的嘆息：

“腰弓背駝挖泥土，
挖到過年不見穀！”

土地的被掠奪和生活的極端困苦迫使農民大量失業並開始流入城市。失業的農民一部分投入了工廠，一部分投入了軍隊。工廠工人每天所得爲三——四角，搬運業及其他各業工人每天所得爲二——三角，最高五角；士兵每月所得餉銀，據上海出版的雜誌“中國白話報”一九〇四年第二十期所提供的材料，爲五元二角。但是工廠和軍隊所能容納的數量有限，有許多農民便在鄉村中和城市中變成了游民。

由於中國民族危機和經濟危機在外國侵略下的繼續尖銳化，義和團的失敗在人民中廣泛地喚起了推翻滿清統治

和徹底進行改革的要求。當時流行的一首民歌寫道：

“這世界，不得了！

富的富（得）不（得）了，

窮的窮（得）不（得）了，

不造反，不得了！”

人民的反抗情緒的繼續增高推動資產階級走上了革命的舞台。

在義和團事件以前，雖然滿清政府一再表明了它的反動頑固的性質，但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仍舊相信依靠它來自上而下地實行改革是挽救危機的最好的辦法。在義和團事件以後，雖然滿清政府對資產階級改良派作了種種讓步，力求使人相信它是願意改革的，並且有許多所謂新派官僚出來公開提倡“立憲”，但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政府日益腐敗和農民抗捐和反對教會的暴動日益增加的情勢下，相信只有徹底推翻滿清統治才能實現改革的人越來越多了。

二

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在人民羣衆的反抗風暴中迅速地增長起來。

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領導的廣東革命分子的團體興中會成立於一八九四年。當一八九五年在廣州起義中遭受了第一次失敗以後，它的活動曾經是非常困難的。孫中山和他的同志們不但在國內而且在國外華僑中被看作危險分子，很少人敢於跟他們接近，謾罵之聲不絕於耳。由於興中會缺乏明確的政治綱領和行動方針，缺乏與

革命羣衆的聯系，孫中山曾經幾次向改良派的首領康有爲和梁啓超建議共同組織政黨，並在一九〇〇年一度因爲英國人的慫恿，相信與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合作利用義和團所造成的形勢號召中國南部各省脫離滿清統治和建立“獨立”政府是可能的。在一九〇一年惠州起義失敗以後，孫中山說，他很少聽到罵聲，並且發現有些人對他的失敗表示遺憾了。他劃清了他和改良派的思想界限並同他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因此也就逐漸形成了他的革命思想。

革命形勢的變化因爲以下的事實而更加顯著：

農民暴動由一九〇三年的十九次增加到一九〇四年的五十二次；

一九〇三年，在上海成立了江蘇和浙江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反滿派的革命團體光復會；

一九〇四年，在長沙成立了類似的團體華興會；

一九〇四年，在武昌成立了湖北革命分子的團體科學補習所；

一九〇四年末和一九〇五年初，爆發了反對美國虐待在那裏作工的中國工人的運動。在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北等省市的學生和工商業紛紛舉行集會，宣布長期抵制美貨（這次抵制運動是有效的。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總值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一直處於跌落狀態，一九〇五年爲五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〇六年爲四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〇七年爲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在一九〇三年以後，各省特別是湖北和湖南有大批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投入滿清軍隊，在士兵中進行鼓動和組

織工作；

在一九〇三年以後，各省有許多學生由滿清政府派到歐洲、美洲和日本留學，而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因為接觸到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反而變成了滿清的反對者，與流亡國外的革命分子結合起來了。

鄰近的日本被成百的中國革命分子和學生當作避難和學習的場所。這些從各地到來的革命分子大大地擴大了孫中山與國內革命運動的聯系。他們在這裏出版了許多向國內發行的鼓動小冊子和報刊。他們揭發了滿清統治的罪惡，介紹了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的歷史，也介紹了英國詩人拜倫（G. G. Byron）、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山陀爾（Petöfi Sandor）、波蘭詩人亞當·密茲開維支（Adam Mickiewicz）的令人奮發的詩篇。

可是革命分子無論在國內或者國外都缺乏統一的團體和共同的綱領。他們的活動在很大的程度上保存着地方的特點，江蘇人辦的刊物叫做“江蘇”，浙江人辦的刊物叫做“浙江潮”，湖北人辦的刊物叫做“湖北學生界”，其他不以地方命名的刊物也都是同鄉會的機關，以論述和報道家鄉情況為主要内容之一。

革命運動的統一成為當時所有革命分子的要求。適應這種要求，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在日本的代表中國十七省（當時中國共有十九省，一九〇七年東三省併入以後為二十二省）的革命分子建立了全國性的革命聯盟——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為中國同盟會的總理。

孫中山在“同盟會宣言”中提出了推翻滿清統治、建立共和國和平均地權的綱領。這個綱領的偉大歷史意義就在

於，它代替農民的太平天國式的建立漢族帝國的思想，第一次地指出了資產階級的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方向，並且宣布：“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

在這個綱領中，值得注意的是，它表明了中國資產階級還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就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的日就衰落的趨勢。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刊詞中，孫中山作了關於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反對滿清）、民權主義（建立共和國）和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初步的論述，清楚地說明了他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見解。孫中山寫道：“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跡于歐美，猶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

孫中山認爲，中國因爲資本主義還沒有發展，受病未深，所以資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後可以採取辦法，避免走歐美國家的資本主義的老路，以便不經過革命直接實現社會主義。這個辦法在當時不是所謂“節制資本”而是“平均地權”。“同盟會”宣言用堅決的語氣宣布說：“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衆棄之！”

孫中山的這種思想，在實質上僅僅是消滅封建剝削和最大限度地發展資本主義。如果作爲社會主義學說——如像孫中山自己所說的——來加以考察，那麼，它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如果從社會意義來加以考察，那麼，它是進步的。它表現了孫中山對於中國革命的堅定的和徹底的立場。在“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一文中，列寧指出，孫中山“完全懂得‘種族’革命之不够。絲毫沒有對政治的漠

視或甚至對政治自由的輕視，或甚至容許中國專制政體可以與中國‘社會改良’、與中國立憲改革等等並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共和國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直接提出羣衆生活狀況、羣衆鬥爭的問題，熱烈地同情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相信他們的正直與他們的力量”●。

孫中山的思想反映了當時資產階級在中國還是一個新興階級的特點。這個階級，正如列寧所說：“不是在下山，而是在上山，不是懼怕將來，而是相信將來，奮不顧身地爲將來而鬥爭，——這個階級憎恨過去，善於拋棄過去之死了的和把一切生命窒息着的腐朽的東西，而不是維持自己的特權，堅持保存和恢復過去。”●

俄國人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英勇的鬥爭精神給予以孫中山爲首的雖然還非常幼稚但是淬厲奮發的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以重大的鼓舞。偉大的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在當時寫給中國人的一封信裏面指出，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狀況是相同的，“所有這些國家的人民都已面臨這樣一個時期，即他們已不可能更長久地停留在如像已往對待自己的統治者的關係之中”。列夫·托爾斯泰警告說，資產階級革命在西方產生的惡果應使中國人民引爲鑑戒，而不去摹倣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以免陷於相同的絕境。列夫·托爾斯泰的對於中國革命滿懷同情的信是中俄人民之間的偉大友誼的最早的紐帶之一。中國人對俄國文學的深刻的愛好也是因爲一九〇五年以後的俄國革命運動而引起的。偉大的中國作家魯迅回憶說：“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爲從那裏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